

# 社会组织面临“领头人”接续难题

# 民间公益,谁来接棒



本报记者 陈醉  
区委报道组 毛一波

几个月前,宁波海曙白云庄社区磨了7年多的“公益豆浆”磨不动了。

“公益豆浆”名叫“五豆坊”,2007年,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许宝玉和3名队员成立磨豆浆志愿者服务小组,为居民磨制由黄豆、青豆、黑豆、豌豆和花生作为材料的五豆浆,只收原料成本价,并免费送给社区高龄老人和五保户。

可今年,许宝玉确诊患了帕金森病,其余几名队员年纪太大、身体不佳,也干不动了,8月,“五豆坊”停业。

民间公益组织面临消亡,并非个案。

宁波仅海曙区就有1200多家靠热心人士发起的民间公益组织,而因“领头人”年岁渐长、精力不济等多种原因,不少公益组织陷入存亡危机。据不完全统计,海曙区仅南门街道就有十余家社会组织消失,放在宁波全市,这个数据将更大。

今天的社会管理,越来越注重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些分散在基层的社会组织,已成为党委、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但民间公益传承为何这么难?如何才能稳稳接棒?这是全社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 “断档”的公益传承人

90岁的王亚萍身体大不如前了,但她放不下的是自己创办的“王亚萍青少年希望书屋”,她每天都要坚持来打理一番。

王亚萍爱读书,2002年在柳锦社区创办了公益书屋,免费对外开放。

“草根类”的社会组织中,领头人往往是公益项目的灵魂。“看到不错的书,我就掏钱买下来,放到书屋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王亚萍说道。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书屋,就靠着她一个人的“财力”,慢慢积累起丰厚的藏书,如今已经有8000余册,超过大部分的社区图书馆,借书累计超8万人次。

领头人的“号召力”是民间公益的优势所在。组建时,凭着领头人的个人魅力,或是因相同的兴趣爱好,几个人走到一起,一个公益项目往往可以瞬间成形,而同时这又是其最大的缺陷。

“一旦领头人出了问题,直接影响整个团队的发展,而且很难找到可以相匹配或者有同等影响力的接班人。”南门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举了个例子,他们曾有个社区文艺团体,领



群众踊跃认领民间公益项目。

头人自掏腰包承担了许多活动经费,舞蹈也是她一力排演,后来她无暇经营,剩下的队员没有一个可以撑起场面,团体因此分解。而像“五豆坊”项目,每天早上4时起来磨豆浆,仅这个条件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这几年,王亚萍眼睛花了,体力弱了。老人说:“总有一天,我会无力经营书屋,就想着把继承权留给社区,可有合适的人继承打理,又不放心!”或者,到时候她只能把书全部捐掉,那书屋也就不复存在了。

数据显示,海曙区的1000多家公益组织里,很多组织组建时间不长,长的十多年,短的也有七八年,积累了不少影响力,有的还成为全市的“金牌公益组织”。但约四成组织的领头人年龄超过65岁,面临传承人“断档”的危机。

## 自发的民间传承“接力”

停业的几个月内,“五豆坊”内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大换血。

“本想一关了事,可居民呼声太高。”社区干部告诉记者,“五豆坊”一停业,几乎每天都有居民找上门。中信白云小区的张月香说,除了去女儿女婿家住的那几天,其余时间她每天都要去喝豆浆,已经5年了。

草根类公益组织虽然人数不多,可影响力不小,没法说关就关。

“老班底的模式靠几个人的长年坚守,如今行不通了,我们试着发挥全社区的力量。”社区和居民商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重新组建公益团队。

新团队由社区老年协会会员和一位专职社区委员组成,16名成员,一个月30天,一个人平均每月轮到两次,专职委员负责排班和团队管理,还制作了值班表。上个月底,新鲜人马上任的“五豆坊”重新开业了。

“五豆坊”新老交接依靠众人力量,而另一个公益团队“恒爱编织站”则试图引进制度、规则,变成公益企业。

在牡丹社区“恒爱编织站”里,40位编织者手中的毛线飞快转动,有人专门负责质量把关,有人专门担当打样师,一切显得有条不紊。手套完工后,编织者可以拿到相应报酬,就像企业的“生产线”。

编织站的项目刚开始也只是三五个人自发编织爱心毛衣,送给孤童。可同样即将步入七旬的创始人严婉贞总觉得,仅靠她的热情,公益很难走得长远,她开始谋划传承。

“企业可以聘经理人管理,经营上百年,民间公益同样可以。”严婉贞说道,如今,编织站开始聘请编织员,大多是下岗职工,织好的毛衣、手套由企业认购、商场寄卖等方式积累公益基金,用来发放工资,而认购的爱心衣物则捐赠给福利院和孤残儿童等,实现双重公益。

如今,编织站已发动了爱心企业参与建设,每个编织站投入12.5万元的种子资金,可帮助15名编织员每年获得人均1万元的额外生活补助。按照设想,3年后,全市将建立公益编织站50家至100家。小公益不但实现传承,还能做大做强。

## 政府“购买”公益专职岗

资源整合?还是企业化引导?海曙区政府也在探索最合适的道路。

最近,52岁的王雅琴正式成为第一个拿工资的公益“领头人”,她负责的是“北斗心灵生命关怀社”,专为老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的管理、运作、组织活动等由她一手操办,每年大约能拿到一万多元工资。

这份工资,来自政府花钱“购买”公益岗位。有了稳定收入来源,王雅琴就可以安心做公益了。

“义务打工毕竟难以维持,容易让项目后继无人。”几年前,王雅琴就开始做公益项目,曾创办为单亲妈妈服务的“月亮妈妈”公益团队。可是一边要上班,一边要干公益,精力有限,项目慢慢停止。而另一个公益团队“星星的孩子”负责人冯东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管理着300多名自闭症儿童家长组成的QQ群,但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公务员。他只能在下了班、照顾完女儿后才能着手处理互助会的事务,难免力不从心。

海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裘丽萍认为,民间公益难以传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头人才的匮乏,政府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帮公益组织找到稳定的领头人。

去年,海曙成立了宁波首个公益组织发展基金会,共有资金300万元,专门扶持民间公益团队,目前已经为200多个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笔经费只能用来开支活动所需,不能用于人头费。今年,海曙试行公益岗位购买,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招聘一批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再分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岗位上,每个岗位可以获得一笔经费补贴。

目前海曙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替北斗心灵生命关怀社、“星星的孩子”家长互助会、恒爱编织站等3个公益社会组织招揽公益人才。

“负责一个项目的公益人才年薪不超过5万元,但也会让一个人同时负责两个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报酬,岗位将实行坐班制。”裘丽萍认为,这可能会成为未来解决社会组织领头人问题的主要途径。“我们也在考虑,对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未来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行政管理费,增强市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 安吉两青年救人被撞 群众捐助爱暖寒冬 让见义勇为者不再孤单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文芳 通讯员 周建巨 蒲璇)当看到路人跌倒,不省人事,他们选择停下来,前去施救。

当他们准备将路人搀扶起来,一辆急速行驶的轿车径直撞上,两名施救者双双倒地。一人头颅重伤,做完开颅手术,仍处于危险期,一人颅内出血,幸无大碍。

当看到见义勇为者流了血,还因此承担高额的医药费,这座城市开始自发汇集起爱的力量,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变得温暖人心。

他们是21岁的安吉小伙任代晖和28岁的王刚。

12月7日晚8时左右,任代晖和姐夫王刚、姐姐任青凤三人驾车行经安吉通往杭州方向的立交桥下桥时,在安吉车站立交桥处发现一位约50多岁的中年男子倒在路中央,旁边横倒着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地上有一摊血迹,身边一辆车子驶过,无人理会。

3人见状,当即靠边停车,任代晖和姐夫王刚下车救人。两人赶到老人身边,并挥手示意由北向南的车辆小心行驶,注意避让。就在两人准备搀扶老人时,一辆轿车径直撞了上来。

突如其来的撞击导致电瓶车驾驶人施某抢救无效死亡,而还未来得及避让的任代晖、王刚双双倒地。

事故发生后,王刚和任代晖被送往湖州九八医院接受治疗。任代晖的病情不容乐观:颅骨碎裂、颅内血管、脑髓破碎,医院给任代晖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实施了开颅手术,虽已清除了部分积血和颅骨,但随时需要进行二次开颅手术。

任代晖家境并不富裕,因母亲脑溢血已花费十几万元,父亲辞职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全家仅靠他一人打零工贴补家用。

截至目前,任代晖及王刚两人已花费医药费十几万元,而这仅仅是治疗费的冰山一角,任代晖二次开颅以及后续治疗的费用更为庞大。

一场因爱心而引起的事件,也让更多的爱心汇集。当得知两名青年因救人被撞伤后,无数市民纷纷伸出援手,爱开始在全城涌动。

任青凤所在的洁美科技公司工会发动全厂职工募捐,累计筹集善款达13万多元;王刚所在的柏腾光电公司送来了1万元;湖州总工会送来慰问金1万元,安吉县总工会送来慰问金1万元,递铺街道总工会送来慰问金1万元……此外,还有无数的市民伸出援手。截至目前,伤者家属账户上收到市民自发捐款已超4万多元。

据了解,目前安吉县政府联席会议已初步确认任代晖和王刚为见义勇为者。

# 天台县推“微服务”模式传递党组织温暖 你有心愿 我来圆梦

记者 包致远 通讯员 徐平 蒋挺

本报讯“优优,别害怕,阿姨在你身边保护着!童车两边有平衡轮子,也很安全的。”

12月16日中午,天台县某企业党员许三红来到平桥镇花西村,陪着8岁的蒋优优练习儿童单车。

优优左脚因后天残疾而两脚着力不均匀,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小姑娘的父母离异,家中房子倒塌,她和奶奶只能住在叔叔家。每次看到同龄孩子骑着漂亮的童车经过,优优的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渴望。

不久前,天台县平桥镇残联上门征集“微心愿”,奶奶把优优的祈祷告诉了工作人员。许三红通过残疾人“中途之家”平台了解到优优的情况后,报名申领了优优的“微心愿”,利用周末把一辆崭新的童车带到优优家,帮优优实现了心愿。

今年初,本报佳友民情工作站推出的“关注留守儿童——圆梦2014”系列报道,刊发50余篇报道,动员社会各界和爱心力量共同为全省未成年儿童筹集了400余万元爱心款,帮助了近2000名孩子。其中,第一篇报道就关注了天台县南屏乡山头郑村郑陈隆和郑晨寒兄妹俩的故事,在杭州和台州许多爱心人士帮助下,兄妹俩完成了新年的愿望。

# 湖州 南浔银行助力治水

本报讯(通讯员 张毅)湖州市南浔区石淙镇羊河坝村的养猪大户潘云章,在南浔银行15万元信用贷款的支持下,成功跨过了技改升级的资金门槛,建起了全套养猪棚、沼气池,以及处理粪渣的配套果园,形成了一个立体化生态农场。

“这一切啊,多亏了南浔银行‘家庭农场贷’的优惠措施。”潘云章说。今年以来,南浔银行投身“五水共治”,主动捐款107.5万元,组织公益宣传活动,并先后投入信贷资金1.5亿元支持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涉污行业转型升级,多方面助推“治水”。

截至目前,南浔银行信贷支持水利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5家,贷款余额2300万元;对接全区16个农房集聚和农整项目以及15个美丽乡村、魅力水乡示范点建设,共涉及信贷资金2.1亿元。

(上接第一版)

## 撬动市场

一路向西,在龙岗镇通往清凉峰镇的道路两侧,堆放着小山丘一般的山核桃蒲。处理这种强碱性物质,曾是让人头疼的难题。据测定,加工出2万吨山核桃,意味着要脱蒲近8万吨。

“我们从农户那里回收,加入催化剂发酵两个月,山核桃蒲就变成花肥,再出口到日本、以色列和阿拉伯。”虹越花卉公司负责人、顺溪村村民方南昌介绍,60%的临安山核桃蒲被他们加工再利用,每年出口花肥6000吨。

“吃干榨尽一颗山核桃固然好,

但我们还想用它撬起全中国的坚果市场。”临安坚果炒货食品城董事长郑淳来说,临安山核桃产业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优势明显;依托山核桃延伸出的碧根果、扁桃仁、巴西松子等的坚果炒货产业,约占全国15%至20%的市场份额。

眼前,一座占地约90亩的“中国坚果炒货食品城”已拔地而起。这里不仅有为电商量身定做的办公用房、供炒货加工企业入驻展示的实体店,还能为周边炒货厂家提供冷藏、仓储、配送等服务。郑淳来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依托‘坚果城’,我们也能做出‘山核桃’指数,为全国大宗山核桃交易提供风向标。”

一颗小小山核桃,展示出临安人的雄心。

# 为农民转产植入鲜活“基因”

## 督查聚焦⑧

本报记者 聂伟霞

清澈的河水潺潺流,田野里绽放着五彩的花朵,空气中弥漫花香……即使不是节假日,衢州柯城区石室乡荆溪村依然游人如织,当地农民开着农家乐,收入盆满钵满。荆溪村实现了从一个养猪村到旅游景点的成功转身。

其实,这番美丽乡村的景象在浙江农村不难寻觅。改变,缘于“五水共治”和“三改一拆”。我省各地推进这两项重点工作以来,许多严重污染环境的非法养殖棚被拆除,臭河变清流,臭气变清新。各地政府也早就在谋划,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养殖户扶持帮助,使一拨拨的农民成功转产转业。

生猪养殖是柯城的传统产业。一直以来,“猪圈靠搭建,粪粪靠直排”这样落后的养殖模式,致农村污

水横流、臭气熏天。自开展“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以来,该区实行全流域禁养。目前,全区退养生猪30余万头,拆除栏舍面积38万平方米,近8.5万名农民面临着转产转业。柯城大胆探索推出“蔬菜大棚换猪棚”三换一改模式,即“猪棚换大棚、猪棚换来料加工、猪棚换菇棚”。该模式按照“拆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标准加50元/亩资金给养殖户进行补助,农业部门开展培训、技术服务、统一配送种苗、有机肥等“保姆式”农技服务,促农民转产转业。

在柯城区万田乡冯坦村翁塘壑水库下,123亩钢架搭建的现代化蔬菜大棚基地正投入使用,中心大道、沟、渠、路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生猪退养户按照相关标准,领到建好的大棚“现房”。

“其实是‘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万田乡谷塘村山后徐村郑洪生道出了生猪养殖户的共同心声。简陋初级

的养殖方式不仅污染环境和水源,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生猪养殖业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郑洪生从事生猪养殖已有十多年,养殖效益时好时坏,甚至出现3年连续亏本,按照以前,没其他出路,亏了还是会继续养,唯一的办法就是等,想着亏两年总能等到赚的一年。而“禁养”倒逼着养殖户转产转业,谋求持续发展的新出路。

“农家乐、来料加工……”在政府的引导扶持下,许多养殖户成功转产转业,但也有迷茫停滞不敢尝试的。50多岁的郑洪生和妻子,除了养猪,没有其他技术。没种过大棚蔬菜,怎么个栽法、温度多少合适、用肥要注意什么等都不知道;小规模种植赚不了钱,想大规模种植又缺资金;种好了,卖给谁,怎么卖等问题都困扰着

郑洪生。即使行情不好,郑洪生还偷偷地“藏”着几十头小猪继续养。

转产转业给郑洪生一样年纪偏大、没有技术的老养殖户带来了阵痛。他们一来担心技术,二来缺资金,三是担心销路。其实,说到底养殖户对转产转业心里“没底”缺乏信心。

因此,政府部门除了在技术、资金上给予帮助扶持外,还需要给农户送“底气”,和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联姻”、技术“嫁接”,让农民看到市场前景,消除他们的顾虑。

要帮助农民真正的转产转业,还需要政府再“俯下身”来倾听农民的心声,感受农民情绪的波动、观念上的碰撞,消除他们的迷茫,并从思想上植入时代鲜活的“基因”,才能催生农民创新精神,才能彻底帮助农民转产转业。

